

他与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

杨 扬

7月4日是茅盾先生诞辰纪念日。我心里一直觉得对绝大多数文学爱好者而言,茅盾的名字是大家熟悉的,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郭沫若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7月4日,是茅盾先生的生日。1896年的这一天,茅盾先生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普通人家,他原名沈雁冰,八岁时,父亲病逝,留下了他和弟弟沈泽民与母亲相依为命。沈雁冰先后在嘉兴、湖州、杭州和北京求学,1916年夏,他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通过亲戚的介绍,于8月28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由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1917年12月,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社会》,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沈雁冰成为沪上文坛极其活跃的新人,他在《时事新报》及上海的各大报纸发表文章,在商务印书馆的各大期刊发表文章。1920年底,受商务印书馆之托,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因改革《小说月报》而与北京的郑振铎等新文化人士结识,成为文学研究会

的发起人之一。在他手里,五四新文学“赢”得了全国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像鲁迅、王统照、许地山、冰心、庐隐、冯沅君等,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后来的老舍、丁玲、巴金等,也在《小说月报》发表过作品。从1922年开始,沈雁冰与鲁迅建立起了通信联系。与此同时,他于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小组活动,成为联络全国各地党员活动的联络员。1925年底,他作为上海中共代表,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后,因国共合作工作需要,留在广州,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的秘书,负责主编《政治周报》。后参加北伐,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编。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与中共失去联系,由此转入文学活动。



1927年9、10月号的《小说月报》,发表茅盾的小说《幻灭》,这是他第一次用“茅盾”这个笔名。换句话说,“茅盾”这一名字,是在上海诞生的。正是从那时开始,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影响越来越大,1933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同时期他的《春蚕》《林家铺子》等短篇小说发表,这些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领袖地位。瞿秋白认为文学史将记住《子夜》这部作品。毫无疑问,《子夜》是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它不仅是用现代长篇小说的形式,展现了1930年的上海城市生活,更重要的,是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展现出他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和开阔的文学视野。譬如,他在《子夜》中对股票交易的描写,其生动性和准确性都是此前新文学作品中所少有的。再譬如他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各色人等的全景式描写,也是以往长篇小说中少有的。他的史诗性的文学笔法,影响了无数代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创作。像上海题材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等,都可以见到茅盾《子夜》的影响痕迹。新世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其作者金宇澄在创作谈中,也提及《子夜》对他的影响。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第一届中国作协主席,负责筹备出版《文艺报》《人民文学》和《世界文学》等重要期刊。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学评论文章,宣传新人新作。像他195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1961年《文艺报》连载的他的《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等,这些文章对于扶持新中国年轻作家的创作,尤其像他对陆文夫、茹志鹃等年轻作

家的创作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创作直接起到激励作用。茹志鹃的《百合花》完成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稿,在《延河》发表后,茅盾先生读后极为赏识,写评论推荐,后来还为茹志鹃的小说出版写序,扩大了茹志鹃在当时文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茅盾先生的推荐、评论,作为文学新人的茹志鹃的文学之路,不会走得那么顺畅。此后,茅盾和茹志鹃一直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四人帮”粉碎之后,茹志鹃多次将自己的作品寄给茅盾先生,请他提意见。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在北京病逝后,茹志鹃闻讯马上就写了《说迟了的话》发表,以表达自己的悲痛和怀念。其他像上海的巴金先生,在纪念文章中也曾说过,他一直将茅盾视作自己文学上的老师。茅盾

的营业执照将期满终止,六月以后不再延期。这对顾来讲,损失太大。此时,周信芳编演的连台本戏《封神榜》正在大卖。用报道中的话说:“无论何时演,都是水泄不通。”忽然停演,不仅会失去日进斗金的机会,而且将面临或空付演员巨额薪水,或名角星散他去的局面。当时的舆论也认为:“剧场戏院关系市面盛衰,非同寻常市肆可比……一旦拆造,首先关系一般下级伶人之生活问题。在此法界共舞台业已拆毁之时期,则此天蟾、大、丹桂之三舞台决不能同时尽付鸠工。”(《三舞台拆屋问题》,《大晶报》1930年5月27日)报道说,纳税人会审议三家舞台提出延期申请时,袁履登首先反对同时拆建。工部局也很快批准了天蟾舞台的营业执照延至1930年底。

其三,10万元补偿是工部局事先同意的条件,无须诉讼。周信芳10月9日日记说:袁履登“为顾四力争工部局赔偿十万元”。而胡文却称工部局裁定“赔金500元”,不知有何根据。顾竹轩获得延期准许后,积极寻找新址。9月,他接手了福州路上的上海舞台(即后来的新天蟾舞台),先改名天声。从北京约来雪艳琴、郝寿臣等名角演出。所以,胡文说顾竹轩赢了“洋官司”,“用这笔钱盘下”天声舞台

也是不准确的。只是在此期间,三家舞台之间起了内讧。据周信芳日记说,大舞台有哈同的势力,获得了延缓两年拆建的许可。原上海舞台的前台经理沈关松因经营不善,劳资纠纷不断,上海舞台被顾竹轩盘走。沈即“在西人方面,殷勤献计”,致丹桂第一台第一个停业拆建。周信芳说:“沈关松之计售矣!”而老天蟾舞台离大舞台很近,周信芳、小杨月楼等的《封神榜》风头又健,对大舞台构成竞争威胁;再加上房东永安公司老板本就想收回天蟾,扩建商场,于是,串通哈同在工部局发难,要求天蟾舞台必须在九月底歇业。

予虚乌有的“官司”

柴俊为

话说:“无论何时演,都是水泄不通。”忽然停演,不仅会失去日进斗金的机会,而且将面临或空付演员巨额薪水,或名角星散他去的局面。当时的舆论也认为:“剧场戏院关系市面盛衰,非同寻常市肆可比……一旦拆造,首先关系一般下级伶人之生活问题。在此法界共舞台业已拆毁之时期,则此天蟾、大、丹桂之三舞台决不能同时尽付鸠工。”(《三舞台拆屋问题》,《大晶报》1930年5月27日)报道说,纳税人会审议三家舞台提出延期申请时,袁履登首先反对同时拆建。工部局也很快批准了天蟾舞台的营业执照延至1930年底。



其三,10万元补偿是工部局事先同意的条件,无须诉讼。周信芳10月9日日记说:袁履登“为顾四力争工部局赔偿十万元”。而胡文却称工部局裁定“赔金500元”,不知有何根据。顾竹轩获得延期准许后,积极寻找新址。9月,他接手了福州路上的上海舞台(即后来的新天蟾舞台),先改名天声。从北京约来雪艳琴、郝寿臣等名角演出。所以,胡文说顾竹轩赢了“洋官司”,“用这笔钱盘下”天声舞台

也是不准确的。只是在此期间,三家舞台之间起了内讧。据周信芳日记说,大舞台有哈同的势力,获得了延缓两年拆建的许可。原上海舞台的前台经理沈关松因经营不善,劳资纠纷不断,上海舞台被顾竹轩盘走。沈即“在西人方面,殷勤献计”,致丹桂第一台第一个停业拆建。周信芳说:“沈关松之计售矣!”而老天蟾舞台离大舞台很近,周信芳、小杨月楼等的《封神榜》风头又健,对大舞台构成竞争威胁;再加上房东永安公司老板本就想收回天蟾,扩建商场,于是,串通哈同在工部局发难,要求天蟾舞台必须在九月底歇业。

这一下打得顾竹轩措手不及。顾四的最终计划当然是把“老天蟾”移到天声。然而,由于营业执照得到延期,而他与永安公司的合约本来就是到年底,他就打了如意算盘:天蟾这边继续演连台本戏,十本《封神榜》之后要排十一本;天声那边则约来京角唱折子戏,来了个京海通吃。不料,京角刚刚登台,工部局就下令歇业。老天蟾人马起码要空等一个月后方能进入天声。于是,顾竹轩狮子大开口。他对记者说,计算损失要54万,而对方只愿承认12万的赔偿。(《顾竹轩先生一席话》,《大晶报》1930年10月6日第2版)一直拖到10月12日夜戏演完才停锣。10月23日,《申报》报道:“因突然中止,损失不资,当经台主顾竹轩迭向工部局呼吁。该局俯恤商艰,认津贴损失费银十万两,款于日前领齐,事遂完全解决。”

金人捧露盘 暮春山居纪梦和竹屋韵

松 庐

梦仙姬。聆仙乐,满仙池。绕瑶庭、玉蕊云枝。飞觞万盏,绛衣醉舞更多姿。清歌云裂,望阳台、晓色依依。春渐歇,月渐隐,声渐远,影渐微。只空响、半壑松吹。桃溪红暗,萋萋烟草使人迷。吟花弹泪,隔东风、又有谁知。

山居日子

廖书兰

我的房子建造在深山里,简单地说,就是森林里有我的家。一般晚上的应酬我大都婉拒,理由是我住在山上,要走一段羊肠小道,沿山坡可见几个不规则的洞口,听说是山猪拱的,因路灯不足,所以太阳下山前,我得赶回家。大部分朋友听后的反应是,“好哇!空气新鲜!与大自然为伴,天人合一,适合写作的好环境。”是的,最初我也以为是这样的,何况家处山顶,依山而建,背山面海,远眺山峦叠翠,内海远洋尽收眼底,家旁边有野生的沉香树、相思树、莲雾树、大树菠萝、荔枝树、龙眼树、木瓜树、香蕉树、杨桃树、五指毛桃、柠檬树、芒果树,甚或我在菜市场买的艾草叶、紫苏叶插入泥土里,约莫两三个星期后,即见郁郁葱葱的艾草海和随着清风摇曳、绿中带紫的紫苏叶,朋友送来石斛,我随地一插竟开满了石斛花。早晨起床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深深地吸一口空气,夏季清晨蝉鸣和鸟声是天然闹钟。

不过山居生活的另一面是哀愁与不堪。冬日夜晚,我和朋友晚餐后回家,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在手脚停车,拒载我上山,理由是黑漆小径,不见路灯。我只好下车步行,半夜壮着胆子走,沿途担心突然出现的山猪、蛇。有一次回家正在开门锁,看见一只癞蛤蟆在墙角的大门前跳来跳去,似在进门进入,花园的杂草堆里还有一只半尺长的蜥蜴,敲着腮帮子躲在豆豉叶下。以前听过,三只蚊子可以炒一碟菜,我当是笑话,现在我亲眼看见飞进我家的蚊子,体型巨大,似一只成年大蜜蜂。卧室里经常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蚂蚁、昆虫,甚至半夜起床,看见枕头边停着不少长脚蚊子,难怪我的身上有好多红肿难消的包,害得我每个月都要用完一条止痒膏。花园的石桌和石凳,有一天竟然倒下了,说是野猪拱倒的,有只野公猪大约200斤重,经常带着妻妾儿女满山跑。

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生活,但需与大自然的蛇虫鼠蚁共处,也算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试探。红尘俗子入深山住上些时日,调养一下心灵,是一种幸福。



峡合虎啸(油画) 刘晓峰

金更多的稿费)。而巴金先生后来在复旦开设的讲座中,热情介绍茅盾的文学成就。1981年,茅盾先生在病重期间,拿出了自己积蓄的25万元稿费,设立资助长篇小说创作的奖金,这就是今天的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奖中影响最大的奖项之一。从这些同时代的作家以及后来年轻作家与茅盾的关系中,是可以看到茅盾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和贡献的。我以为在现代中国文学中,茅盾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第一流的,不阅读或不熟悉他的作品,对文学爱好者而言,是一种损失。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29周年,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去读一读他的作品,感受一下他作品的文学魅力。

我想,上海人最朴素的早餐莫过于泡饭了吧?吃泡饭的习俗究竟从什么时候流传开的,我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着泡饭成长起来的。说泡饭是上海的传统美食一点不为过。不记得是哪位美食家说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上海人,就看他吃泡饭时会不会把酱瓜切成丁,把半颗咸蛋黄用调羹压碎后拌进泡饭里……”这些细微的习惯构成了上海人对泡饭的味觉记忆。

我小时候对泡饭的味觉记忆也就是常规的老三样:酱菜、乳腐和油条。一根油条被剪得碎碎的,浸在浓浓的酱油里,这种混搭是泡饭的标配,也是上海人最熟悉的搭配。说到配乳腐我还想起了件糗事,当年弄堂里的一户人家夫妻俩加四个孩子,一到饭点就把小方桌搬到弄堂里,我站在一边看他们一块乳腐6个人分,哪里是分,分明得抢。

馋得我回家就问母亲要了钱去酱园店买了块同样的乳腐,回家后还特地加了白糖和麻油,可过泡饭时并不觉得惊艳啊。看来拉满情绪价值的食物才美味。

在吃泡饭这件事上,上海人是既务实又精致的。听我妈说,她的学生时代也“追星”,明星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关心的话题。她读到过报纸报道上海名媛流行牛奶煮泡饭并搭配面包果酱的“摩登早餐”。现在看来这样的中西融合的确有营养。在生活艰苦的年代,泡饭是上海人不浪费一粒粮食、勤俭持家的写照。但上海人又有吃的智慧,让一碗泡饭处处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舒适。

我母亲那时就讲究一个“不时不食”的时令搭配。她会在春天用咸菜豆瓣酥提鲜,夏天用酱麻油西瓜皮解暑,秋天用萧山萝卜干炒毛豆。她还擅长把隔夜

菜烧进泡饭里,再加上点新鲜蔬菜,关上煤气时舀上一小匙猪油放进去,一碗菜泡饭香喷喷热烘烘,鲜得掉眉毛。

这种化平凡为精巧的本事能够折射出上海人追求生活品质的方式。后来市场繁盛了,上海人家的泡饭搭配也跟着丰富了起来,什么福建肉松、虾子鲞鱼、高邮咸蛋、油余果肉,是个从“将就”到“讲究”的过程。

如今的泡饭处处接纳了新的元素,豪华版的泡饭已经成为上海一些餐厅的招牌菜。我吃过龙虾泡饭、带鱼泡饭,还吃过加入了炒米和锅巴的泡饭,越做越高级、越精致,价格自然水涨船高,竟然达三位数。不过,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些高版本的泡饭融进了海派文化,值这个价。我从来没想到过,自从电视

连续剧《繁花》热播后,“宝总泡饭”以及九宫格酱菜成了一款“上海符号”,甚至还带火了酱菜的销量。我几次经过淮海路那家全国土特产商店,每一次都见排队买酱菜的盛况。与其说上海人专程买酱菜打卡,还不如说大家热衷的是一种情怀。

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报道:已故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宴请台湾客人时就上过一道菜泡饭,他在用家常味传递着对同胞的亲切与诚意。的确,看似普通的泡饭最能体现上海饮食浓油赤酱与清淡爽口并存的特点。

泡饭在上海特色美食中有它的“两面性”:既是寻常百姓的家常便饭,也是餐桌上海派文化不可替代的一页。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尚在泡饭身上诠释着。

十日谈

上海人将糟卤浸渍过的熟食唤作糟货。 责编:沈琦华